

## 旅行、紀事與他者視角

——岡千仞《觀光紀遊》中的清末中日學術

孫瑩瑩

**提 要：**岡千仞（1833-1914）為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之一。光緒十年（1884），岡千仞啟航東渡，遊歷中國。其足跡北至燕京，南抵廣東，此後出版的《觀光紀遊》中記錄了一個具有中國文化學養的外來者對晚清時事和學術的看法。本文從旅行書寫的角度，剖析《觀光紀遊》作為遊記的結構和價值。同時，以《觀光紀遊》為中心，論述岡千仞在中國期間與士子的交遊討論。從岡千仞對六經和科舉的態度出發，剖析明治維新後日本人眼中的清末學術生態。

**關鍵詞：**岡千仞；旅行；他者；中日學術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其中就不乏關於空間移動和旅行的記錄。從最初簡單的紀事，到後來詳細的見聞記錄和心理描寫，直至遊記體裁的出現，文字記錄了人類文化的進步和複雜性。旅行有多種可能，從故鄉至他鄉，由熟悉到未知之地，從一種文化內部到另一種文化，不同的旅行者、旅行的記錄者對於相同的一段旅程可能有不同的觀感和理解。旅行帶來新知和發現，是對舊有世界和想像的再現或動搖。旅行和旅行書寫，大多數與人類記憶相關，同時也與寫作者的身份和認同有着密切的聯繫。人們為什麼要在土地上移動，旅行到另一個地方？旅行的目的是什麼？書寫的目的幾何？由於旅行路線、書寫者的身份、社會階層、學養、眼光、立場和視域（horizon）的差異，書寫的內容也隨之變化多端。簡單來說，同一個文化現象，在不同人的筆下會有不同表現。空間移動所帶來的文化想像的變化，視角的轉換，以“他者”“觀看”的角度，回顧或對照本土文化，更能反映敘述者自身的文

化認同。

本文要討論的這部遊記即是作者從他者文化的立場出發，對於晚清中國學術、文化的觀察和書寫。岡千仞《觀光紀遊》寫於1886年，與山本梅崖《燕山楚水紀遊》（1899）、竹添光鴻（1842-1917）《棧雲峽雨日記》被譽為明治時期（1868-1912）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漢文體中國遊記。<sup>①</sup>隋唐以來，日本主流社會大多將中國文化視為優雅和美好的代表，往來的人士以使節和宗教人員身份居多。明治維新之後，隨着歐美諸國實力的壯大，日本國內崇歐貶中的思想逐漸抬頭——“今也，國家與海外列國訂盟，互差公使，以駐國都，冠蓋來往，相尋於途。學士大夫亦以審外情為先務，爭講西學。”<sup>②</sup>前往歐洲遊歷的日本人數量大增，而幾乎沒有人願意前往被視為落伍的中國，<sup>③</sup>以學者身份前往中國的更是少之又少。<sup>④</sup>據《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國旅行記》中的統計而言，甲午戰爭之前，僅有10部到華遊記在日本出版，而全書收集的日本人在中國的旅行記錄達數百種。<sup>⑤</sup>正因如此，岡千仞等人的中國遊記反映出明治早期親歷中國的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印象，具有一定的獨特性。近來學界對於《觀光紀遊》的版本有所整理，對其文本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史實層面的描述和文本脈絡的梳理，對其思想和學術層面的分析稍顯不足。<sup>⑥</sup>

與旅行記錄不同的是，《觀光紀遊》逐日記錄見聞和感想，實則為一部

- 
- ① 張明傑，〈近代日本人中國遊記總序〉，岡千仞著，張明傑整理，《觀光紀遊·觀光續記·觀光遊草》（北京：中華書局，2009），8。
- ② 《滬上日記》，《觀光紀遊·觀光續記·觀光遊草》，67。
- ③ 高銳一，〈觀光紀遊·序〉：“夫漢土大國也，而中世以後，政綱漸弛，士大夫不知域外大勢一變，非尋常思想所能及，墨守舊學，說唐虞三代，以禮樂文物大邦自居，語及域外，則曰夷狄禽獸。嗟乎！亦誤矣。”《滬上日記》，66-67。
- ④ 丸山鑛子堅，〈序〉，《觀光紀遊》，24。在岡千仞之前，明治九年（1876）竹添光鴻曾往中國遊歷。
- ⑤ 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國旅行記（解題）》（東京：東洋文庫，1980）。
- ⑥ 有關《觀光紀遊》的中文研究可參見王曉秋，《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118-124。陳華，〈從《觀光紀遊》看岡千仞眼裏的中國〉，《楚雄師範學院學報》，7（2010）：73-78。英文討論見 Joshua A. Fogel,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74-83.

日記。<sup>⑦</sup>作為一部日記，《觀光紀遊》的論述帶有一種私密性；然而岡千仞歸國後將之整理出版，因此其中又有宣傳旅行體驗的公開性和話語性。在旅行中，作者每日記錄所經地點、風景、人物及風俗人情，其中必然含有作者的見解、感受、情緒波動和想像，由此亦可折射出近代日本人中國觀的轉變。

## 一、旅行與書寫

王韜《扶桑遊記》云：“日國人才，聚於東京，所見多不凡之士，而鹿門尤其佼佼者”<sup>⑧</sup>，由此可見王韜對於岡千仞的推崇。岡千仞字天爵，號鹿門，遊學江戶時改名為修，入昌平黌，師事安基良齋。繼而從事倒幕運動，明治初年改名千仞，字振衣。學問以經史為主，在東京為漢學名家。光緒十年（明治十七年，1884），受到王韜邀請，岡千仞動身來華遊歷，同行者有駐日使館隨員楊守敬（1839-1915）、侄岡濯等。<sup>⑨</sup>旅行全程歷經“上海，遊杭蘇，聞法虜構難，歸上海。是秋遊北京，窮居庸、八達之勝。南經保定，出於天津，歸上海。次春遊廣東，不幸感瘴毒，就治香港，療養十旬，至四月東還。”<sup>⑩</sup>前後在中國遊歷共一年有餘，行程範圍北抵北京，南至香港，旅行途中多接觸當地的風土人情，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有切近的體驗。

《觀光紀遊》全書共六篇十卷。淺田惟常在序文開頭即云：“遊之有益於學也，久矣。”指出旅行與增長見聞學識之間，自古以來就有着密切的聯繫。<sup>⑪</sup>元田直的序文中列舉岡千仞此行所遊覽之處，可以“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所由”。<sup>⑫</sup>岡千仞主張學習西方學說，但不偏廢日本古學和傳統文化，在明治前後均不受在位者的歡迎。在遊覽古跡的旅途中，記敘感慨，發洩不得志之情懷，似乎是歷來失意文士之選擇。元田直就此點出岡千仞中國之行對

⑦ 《觀光紀遊》初版於1886年8月，1892年再版。初版有各家題名，再版時刪去。見張明傑，〈岡千仞遊華及其所作遊記〉，《觀光紀遊·觀光續記·觀光遊草》，12。

⑧ 鍾叔和主編，《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412。

⑨ 《觀光紀遊》，9。

⑩ 《觀光紀遊·自序》，3-4。

⑪ 《觀光紀遊》，7-8。

⑫ 《觀光紀遊》，9。

於個人以及歷史的意義。在《觀光紀遊》的自序中，岡千仞描寫對於旅行的愛好，並列舉在日本國內曾經遊歷過的地方，為接下來的出國漫遊做鋪墊。繼而論述遊歷中土的目的在於，中日文字同源、儀軌相近，中國的經史文藝、制度沿革等等，都曾受到日本學者的重視，所謂讀其書而觀其人，“誦其書而窮其旨，而不一遊其域而可乎？”<sup>⑬</sup>中國文化與日本同源，是當時日本漢學界的共識。書本上的知識應當由實際的旅行經驗來完整，這也包含在“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中國傳統思想中。

岡千仞指出，寫作遊記的目的在於“紀道路所由，耳目所觸，往覆諸友所問答。”其潛在的論述對象是當時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日益增長的歐風習氣。日本當時激進的學者認為，舊有的東方文化和滿清統治下的中國，已經無足取法。岡千仞卻以傳統學問的立場出發，反對蔑視中日傳統文化的做法，認為需要結合中西文化之精華，這樣才是正途。<sup>⑭</sup>岡千仞喜愛談論西學，並以此議論中國現狀。因而亦喜歡與涉獵西學的中國士人交遊。離開京師之際，因未能見到丁韞良所推薦的同文館弟子席瀚伯，岡千仞特意記下一筆：“此人涉洋學，惜止一面會。”<sup>⑮</sup>只可惜當時關心西學的中下層文人寥寥無幾，在旅途中，關於岡千仞所談論的西學，所遇中國文人的態度大多是默然以對，或往返數紙，以傳統文化的立場批駁岡千仞的觀點。基於這種抵觸態度，岡千仞對中國士子索觀日記頗有隱晦之感：“日記，日錄所見聞，余域外人，與中人異所見，此間不可輒示人。”<sup>⑯</sup>

因為只能閱讀書寫，不能用漢語口頭交流，故而岡千仞通過書信及筆談介紹，拓展其自身的交遊網絡。與岡千仞交遊面談的文人來自於不同的社會階層。既有李鴻章、盛宣懷、俞樾、張裕釗等當時的達官碩儒，又有當時功名低微的書院士子和儒士，包括袁昶、李慈銘、沈曾植兄弟等。遊記中記錄在蘇州時，因為無法加入談話，岡千仞在當地文人的聚會中“癡坐其旁”<sup>⑰</sup>。這既流露出作者較為失落的情緒，又使得文字的描寫更為敏感細

<sup>⑬</sup> 《觀光紀遊·自序》，3。

<sup>⑭</sup> 《觀光紀遊·自序》，4。

<sup>⑮</sup> 《燕京日記》卷下，125。

<sup>⑯</sup> 《燕京日記》卷下，120。

<sup>⑰</sup> 《蘇杭日記》卷上，30。

緻。由於以筆談為主要交流方式，所以岡千仞在日記中多記錄對方神態，如“笑”、“不言”等。神態描寫增加作者和本書讀者對談話的理解，可謂是一種獨特的交流和觀察角度。此外，通過實際經歷，岡千仞對於當時中國官員和人情世故有了更為切身的體驗。如中土應酬名目太多，“真不知敬為何意者”。<sup>⑱</sup>初次到上海時，岡千仞曾求見道台邵友濂（1841-1901），卻不得見。後至京師，雖持有盛宣懷書信，訪張蔭桓（1837-1900）數次，均不獲見。張蔭桓曾經兩入總理衙門，對於洋務較為熟悉，因而岡千仞試圖與之結交。有了這幾次遭拒絕的經驗後，岡千仞在日記中感慨：此前在日本時，與黃遵憲等駐日官員交往甚密，筆談不輟；來中國之後，即便是求見何如璋、張斯桂等舊日熟識都屢屢碰壁。岡千仞因此感慨“忌外人，中土風習，與我邦維新前，忌歐米人一般”<sup>⑲</sup>，對這種保守的風氣有一種理解之後的無奈。則是從中日比較的角度，記錄對中國風土人情的觀感和理解。

## 二、視角及自我

旅行所帶來的空間移動，必然涉及到觀察者視角的轉換以及他者（the other）與自我（self）的對比和衝突。在《觀光紀遊》中，“自我”是指明治之後西化的日本，“他者”成了被觀看的、落後腐朽的中國以及思想保守的士子學者。岡千仞在“例言”中指出，手札意在記錄“中土政體風俗”，批評其“失政弊俗”，希望中國有識人士可以以此為“藥石之言”，加以改革。<sup>⑳</sup>但從岡千仞所記錄的經歷來看，似乎這樣的願望太過理想化。

在蘇州時，楊守敬在聚會中每談及日本見聞，滿座皆為哄然。可想見當時國人對日本除了好奇之外，還有鄙夷的成份。從上海出發向北方遊歷的途中，岡千仞轉換水陸交通工具，與尋常的中國旅人不無分別，因而對中日、東西的語言、禮儀和風俗有如下思考：“我俗席地而坐，食無案桌，寢無臥床，服無衣裳之別，婦人涅齒，帶廣蔽腰圍等，皆為外人所訝者。而中人辮髮垂地，嗜毒煙，甚食色，婦女約足，人家不設廁，街巷不容車馬，皆不免

<sup>⑱</sup> 《燕京日記》卷上，94。

<sup>⑲</sup> 《燕京日記》卷下，121。

<sup>⑳</sup> 《觀光紀遊·例言》，5-6。

陋者。未可以內笑外，以彼非此。抑我與中土同文鄰域，而猶異其風俗如此，況歐米遠，人異種類，宗教文字，冰炭相反者乎？而今五洲往來，互訂友誼，此真宇內一大變。”<sup>①</sup>這段文字列舉出中日中下層社會在日常起居、服飾、男女裝束、鴉片、纏足、飲食、衛生、城市規劃等風俗習慣的各個方面的差異，並藉此對於東方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民族習性及思想傾向作出解釋。在對比之中，岡千仞以“陋”形容中國的民情；日本因學習西方的緣故，則成為先進、向上的典範。在中國士子特別提出，明治之後日本人改衣冠，穿歐美服飾的疑問時，岡千仞的回答為，易服是操練現代軍事所必須，自己因為不習從西方實務，故而仍穿着傳統服飾。這一解釋中充滿了對日本明治文化的自信。岡千仞因此感慨“中人以衣冠文物自負，特不知今所服滿服，今所奉滿制，衣冠文物，亡已久矣。”<sup>②</sup>既反映了自清代以來朝鮮和日本所共同持有的對滿清統治的蔑視情感，又完全以西方文明的標準來衡量傳統中國之進步與優劣。

旅途中主要的交通工具為車馬和船隻，因此岡千仞對中國城市的街道和衛生有切實體驗，其關注的角度，則帶有現代的、西方的眼光。日記中多次提到中國市鎮規劃混亂，氣味污濁。如在山東兗州時，城市剛剛開埠，“入市街，里巷斜歪，道路欹仄”，岡千仞因此驚訝——“街區漫無制度，牧守不用心此等事歟？家屋皆積石塗墜，洋館以外不見一架樓者。”<sup>③</sup>士兵則擁擠在城隍廟中，觀劇取樂之時，“吹煙食果，相顧笑談。”如此無軍紀約束，何來軍備之談？西方人居住地乾淨爽潔，中國人居處的市鎮則毫無規劃，衛生堪虞。至天津租界時，“康莊四達，左右植卉木，各國公衙高揭國旗，互競宏麗”；西折至市廛，則“城壁屹然，道路狹隘，人馬旁午”，“市店雜沓，穢臭沖鼻。”<sup>④</sup>一旦大雨，道路卑污，四處積水如湖沼，“大廈欹圯”。岡千仞因此感慨舊日萬邦來朝的中國，現在城市狀況竟然如此糟糕。<sup>⑤</sup>即使是京師，也是道路破壞，橋樑、宮室四處廢頹，流民盜竊之事不

① 《蘇杭日記》卷上，30。

② 《燕京日記》卷下，129。

③ 《燕京日記》卷上，94。

④ 《燕京日記》卷上，95。

⑤ 《燕京日記》卷下，117。

絕，“特怪士大夫貪婪無行”所致。<sup>②⑥</sup>中國市鎮之污亂，歸根結底在於負責官員的失責。同時，岡千仞以遊學歐洲的中國士子望南對城內建築、人群舉止、衛生、吸鴉片等的厭惡，甚至名之“動物博覽場”，佐證自己的觀點。<sup>②⑦</sup>每至中國簡陋之處，岡千仞即回援日本國內的例子用以對比，“我邦維新以前，無所無丐徒，唯未至陸續如斯。”<sup>②⑧</sup>在岡千仞的記述中，昔日未接受西方影響的日本乃今日之中國，自我與他者之間譬如昨日與今日之日本的差別，兩者得以溝通的橋樑乃是西學。

岡千仞遊大善寺時，市民見其“異服，簇擁，有投瓜皮瓦石者，猶我邦三十年前，歐人始來江戶時。”<sup>②⑨</sup>在岡千仞眼中，中國當前的現狀與三十年前的日本幕治晚期不無區別——這種對比在日記中隨處可見。“顧中土承二百年太平，敝竇百出，與敝邦幕府末世一般。”<sup>②⑩</sup>中國之所以面對這樣的困境，與明治改革之前日本面臨的歷史情況相同。因此，如果要追趕上當下的日本，中國必須從思想上接受西學的改造。譬如中國讀書人多兼醫術，不似日本世代以行醫為職業，但當時即使是靠近口岸的地區如廣東，文人仍然不相信西醫，“猶我邦三十年前爭排歐醫時”。<sup>②⑪</sup>就連在時事等觀點之上，岡千仞將當時的中法戰爭，以日本幕府末年所遭遇的西方入侵相比。<sup>②⑫</sup>岡千仞對於西學如此推崇，以至於見識到中國風俗中好的一面時，認為類似西方，完全未考慮是否即中國舊俗。在杭州時，僧無適談及杭州有義莊如普濟堂、育嬰堂、清節堂時，岡千仞稱“此等類歐俗”。<sup>②⑬</sup>實則，此類義舉本為中國古有。

明治維新的成功，使得岡千仞對於日本當時的文化具有強烈的自信，同時亦以西學為學術之標的。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遊記中多次提到中土文

②⑥ 《燕京日記》卷下，123。

②⑦ 《滬上再記》，159。

②⑧ 《燕京日記》卷下，122。

②⑨ 《蘇杭日記》下，55-56。

②⑩ 《燕京日記》卷下，134。

②⑪ 《粵南日記》卷中，183。

②⑫ 《燕京日記》卷上，97-98。

②⑬ 《蘇杭日記》上，卷2，36。

人對於西方知識的無知和漠然。學者平時講論《論語》、《孟子》，論及外事時，卻則多以猜疑為主。一旦國家遭遇強寇，官員卻“素位而行”，“距學之本旨愈遠矣。”<sup>⑳</sup>是可見，雖然“同治中興”時曾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但此類主張仍集中於少數知識份子和上層開明人士之間。<sup>㉑</sup>中國的官員甚至不知道汽車這類西方的基本知識，岡千仞因此歎道：“我邦維新以前，滔滔皆是，此亦不足怪焉。”<sup>㉒</sup>就學術思想而言，中國文人的治學眼光仍停留於傳統的闡釋譜系之中。岡千仞論述經書之謬誤，認為《春秋》中“日為蝦蟆所食”，實則為西學所解釋的日食，而與之對談的士子則十分愕然，認為是驚人之語。<sup>㉓</sup>岡千仞提及西方譯書的重要性，並自謙“無用經史”時，即使蔡輔臣以好談外事聞名，仍然認為不識治學根柢。<sup>㉔</sup>在保定，丁汀驚論學問之途，由學業轉而認定“金石考據為學問之本”，“考據、說文、金石、地理”，四者實則為一事，並尤其佩服閻若璩（1636-1704）、錢大昕（1728-1804）二家。在談論治理夷狄之策時，王廷鼎主張仍從二十四史中尋求答案，認為日本不當向西方尋求致富之道。而岡千仞卻認為如今“陸有輪車，海有輪船，網設電線，聯絡全世界之聲息，宇內之變，至此而極矣。而猶墨守六經，不知富強為何事。一旦法虜滋擾，茫然不知所措，皆為此論所誤者。”<sup>㉕</sup>當今世界應當廣知世界知識，不應該只墨守中國傳統學問，由此而得出當時中國士子為六經所毒的結論。

岡千仞對經學的態度是，“方今所急，不在於萬卷經史，而在於究格致之學，講富強之實。如經史，略涉大旨，詩文足達己意，可以已也。”<sup>㉖</sup>相比之下，“中人死執經書，若懸空論事，則紛然駁繫，退引經書一二語折之，不敢妄爭。納諫自牖之義，不可不知。”<sup>㉗</sup>其謂“六經毒”，實則為憤

⑳ 《燕京日記》卷上，104-105。

㉑ 《燕京日記》卷上，102。

㉒ 《燕京日記》卷上，103。

㉓ 《蘇杭日記》下，56。

㉔ 《燕京日記》卷上，114。

㉕ 《蘇杭日記》下，59。

㉖ 《燕京日記》卷上，114。

㉗ 《粵南日記》卷上，175。

激之語，背後有着複雜的含義。岡千仞向當時在中國的岸田吟香解釋道：“六經豈有毒乎？唯中人拘泥末義，墨守陳言，不復知西人研究實學，發明實理，非爛熟六經所能悉。孟子不言乎？盡信書，不如無書。六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不信其可信者，而信其不可信者，則六經之流毒，何異老莊之毒晉宋乎？”<sup>⑫</sup>即治學不應該拘守於古代經籍之中，而應觀照當世，以所學為所用。岡千仞對六經並不排斥，在與岸田吟香論中國城市隘陋時，岡千仞引毛詩“四墉百雉”、《左傳》“車並九軌”，反駁吟香對中國城市簡陋的解釋，卻反被笑作：“子亦醉六經毒者。”<sup>⑬</sup>由此可見，作為一位浸淫中國古學的學者，岡千仞並不反對讀六經；而是在如何閱讀和運用六經的問題上，岡千仞與當時的中國士人有很大分歧。在旅行中，由於岡千仞具有史學修養，對所經之地多引古詩文作溯源考據的解釋。如《航滬日記》開篇即記上海古稱由來。描述旅途景色及見聞的同時，考論地名等歷史演變，間引史料作旁注。如介紹黃浦江之來由。<sup>⑭</sup>經上海至芝罘（即今煙台），所經黑海，引日本九州西北洋名“玄海”互證。而自芝罘至天津，所經之渤海，則聯想到日本舊史。<sup>⑮</sup>形容江南水文澄澈，引柳子厚“韜涵大虛，澹灩里閭”二句，<sup>⑯</sup>江舟下壩，又引陸遊《入蜀記》中“一日出三閘”為典。<sup>⑰</sup>這些都是岡千仞“六經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苟信不可信者，流毒無所不至”見解的表現。岡千仞又引黃公度的見解稱六經為形而上論，若談及形而下、機器之學，必須正視歐美發明的價值。<sup>⑱</sup>可見，岡千仞對於六經並非全盤否定，而是希望在熟悉六經的基礎之上，以西學為效法對象。由燕京返回上海時，岡千仞通過張煥綸向道台邵友濂提出建議，以日本之經驗反觀當下中國之局勢。認為太平天國之亂，仍然是中國國族內部的矛盾。中國文化最大的危機在於，如果淪為英法的殖民地，則六經被基督教經義所代替，如同印

<sup>⑫</sup> 《滬上日記》，69。

<sup>⑬</sup> 《滬上日記》，79。

<sup>⑭</sup> 《觀光紀遊》，14。

<sup>⑮</sup> 《燕京日記》卷上，94。

<sup>⑯</sup> 《蘇杭日記》上，43。

<sup>⑰</sup> 《蘇杭日記》上，44。

<sup>⑱</sup> 《蘇杭日記》下，53-54。

度、安南一樣失去其原有的文化積澱。<sup>④</sup>歸根結底，岡千仞十分重視六經的價值，並將之視作中國文化的根柢。

### 三、中日學術與他者呈現

岡千仞此次來中國旅行，與文人交遊多以交流詩文、學問和時論為主。在蘇州時，士子們多向岡千仞贈送書籍和書畫等，如顧文彬向岡千仞出示“東坡謝表、松雪臨王帖、宋畫、羅漢像、宋人寫經、宋刻九成宮銘，未附大家跋語”；潘麟生則贈以《庚申惡夢記》。岡千仞對俞樾十分推崇，記錄其論文章之道無中日之分，而論文講學則需要認清“門徑”，即經學須上法漢唐，詩文當抒寫性靈，才能“摹寫景物，氣味自別。”<sup>⑤</sup>在京師則與士子互贈和韻詩。因見疊韻二首，每句註本事，每名附註，則稱為創體。<sup>⑥</sup>其實清代詩歌之疊韻經常達數百韻，註本事更是平常，岡千仞初次見識，故而以創體稱之。離京之時，與文友互贈詩文題跋。<sup>⑦</sup>有容生贈長篇，詠日本“文學沿革，詳密可驚。”<sup>⑧</sup>岡千仞對中國士人的學問表示驚歎。返回上海之後，與李士棻交遊，互贈詩文稿，李士棻以名士視之。<sup>⑨</sup>岡千仞認為詩歌不重聲調，重在神韻。<sup>⑩</sup>與當時詩壇逐漸興起的注重學問的宋詩風格有不同的取向。

在蓮池書院時，岡千仞晤張裕釗（1823-1894），問為文章之法。張裕釗是曾國藩四大弟子之一，時任蓮池書院山長，是晚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答為文當以姚鼐《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為典範，“古今文法盡此二書。姚撰精嚴，曾撰宏博，已有此二書，古文正範，不必他求。”如果要熟悉駢文，則當讀李兆洛《駢體文鈔》。<sup>⑪</sup>張裕釗為之序岡千仞文

<sup>④</sup> 《滬上日記》，83-84。

<sup>⑤</sup> 《蘇杭日記》卷上，32。

<sup>⑥</sup> 《燕京日記》卷上，105。

<sup>⑦</sup> 《燕京日記》卷下，117。

<sup>⑧</sup> 《燕京日記》卷下，124。

<sup>⑨</sup> 《滬上再記》，143、146。

<sup>⑩</sup> 《觀光遊草·引》，287。

<sup>⑪</sup> 《燕京日記》卷下，128。

稿，大旨為中日同文接壤，輔車相依，但仍有以日本為異夷，以中國自居之言。<sup>57</sup>

在上海初見袁枚之孫袁翔甫時，岡千仞得知隨園的小倉山房已經毀於火災，《隨園三十種》的刻版已經亡失。岡千仞因此感歎，“隨園一代泰斗，名籍海外，而未三世，子孫飄零，遺著散逸，此可為嘆。”<sup>58</sup>當時中土的學術風氣已經轉向經世，袁枚有關性靈的主張已經不太受讀書人歡迎，故而由此變故。可見中國學術風氣的變化，及與其在日本影響的差異。岡千仞稱俞樾為一世泰斗，其學問重在考據。問及當時日本大學者時，同行楊守敬列舉當時考證大家狩屋腋齋為第一，其弟子森養竹亦是名家。岡千仞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治學並非僅考據一端，“若曰考據，腋齋為第一，可也。至舉養竹，阿所好，亦甚矣。”<sup>59</sup>由此可見當時日本學術已經不以考據為首，而以西方學術為風尚的轉向。

余姚朱朗然（弢夫）與岡千仞筆談時，論及家學《說文》之重要性，稱“體格源流，音訓異同，形義假借，運用虛實，四者許書源流，不可不講。”岡千仞專治史學，以為《說文》同《急就章》為童蒙雅訓之書，弢夫的反應則是“閱後不答”，岡千仞私下以為其“不平余以《說文》為童蒙書”。<sup>60</sup>除此原因之外，還因為岡千仞不了解清代樸學的傳統，令弢夫覺得無以作答。清代樸學的基礎在於小學。先能識字，方能讀經。在這一傳統之下，清代中期湧現出諸多小學研究成果，代表作品就是王引之、王念孫父子的《經義述聞》。《說文解字》作為最早的文字學著述，清代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四部代表性的說文研究著述在清中期都已完成，當時文士多以此為家學，歷數代而研習之。而當時日本並無這一傳統，因而雙方對《說文》一書的重要性產生不同見解。

與蓮池書院學子筆談時，岡千仞的主要觀點是“凡士人讀書學問，將有為於當世也。”當以“講八股之餘力，旁讀譯書，以講究彼所以日至富

<sup>57</sup> 《燕京日記》卷下，130。

<sup>58</sup> 《觀光紀遊》，19。

<sup>59</sup> 《觀光紀遊》，28-29。

<sup>60</sup> 《蘇杭日記》下，54。

強”，改變千年來之陋習所見。又斥科舉為誤天下之本，但仍難獲得多數認同。岡千仞又論中國上古三代之學仍講求格致實用，今世科舉是誤入歧途。與之相比，歐美學校制度能治格致之學而富強五洲，中國人不細考究，徒以機巧奸詐形容其成就。<sup>①</sup>反觀科舉之極不容易，學子皓首窮經，故而無精力關心國家大事，亦是明清人批駁的舊說。<sup>②</sup>馮桂芬之子馮申芷關心日本取士制度，指出當世人不講實學，援引廖燕學說抨擊科舉。岡千仞為之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以學校取士的制度，特意指出是仿歐美而來，同論中國科舉之弊端。<sup>③</sup>與京城文士交遊的過程中，眾人食葡萄羹，李文田即賦詩“五排二十八韻，每名注葡萄典故，引書涉三四十種，該博可驚。”岡千仞又云在座翰林徐、朱一新和蔡輔臣，皆“腹中萬卷，任筆直書。”因此，“科舉雖有僥倖，要非無才者所為也。”<sup>④</sup>此後岡千仞對科舉的態度有所緩和，認為科舉不可立時改動，當先設“格致、算數諸術取士”，以觀後效。<sup>⑤</sup>然而最終仍須革除科舉，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中法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流，其內容已經逐漸發生變化，日本成為接觸西方思想的主要中轉站。在上海時，岸田吟香提及上海人士對於日本的關注：“中人漸用心東洋大勢，《東瀛詩撰》、《朝鮮志畧》、《安南國志》等書盛售。”<sup>⑥</sup>但其關注仍然局限於表面，岡千仞認為，即使如玉韜這樣比較了解西方的文士，仍未能參悟西方學術之精髓。對於玉韜認為日本僅學習歐美皮毛的看法，岡千仞表示贊同，因為歐美文化的精髓並非一朝一夕可以習得，而日本正因學習歐美之“皮毛”，即軍事機械等實學，才能免於中國當下的命運。其論述中充滿了對日本現狀的自信。<sup>⑦</sup>張之洞《書目答問》只講求洋務之具體事務，卻不講西方哲理之書，未能體察西學的細微精妙。<sup>⑧</sup>作

① 《燕京日記》卷下，130-131。

② 《滬上再記》，156。

③ 《燕京日記》卷下，116。

④ 《燕京日記》卷下，120。

⑤ 《燕京日記》卷下，124。

⑥ 《觀光紀遊》，16。

⑦ 《燕京日記》卷上，91。

⑧ 《滬上再記》，149。

為一個外來文化的旅者，岡千仞的觀察可謂切當而細緻，當時中國仍以現有典章制度為正體，對於西方和日本自有不屑一顧之感。

面對當時中國的局勢，岡千仞主張當以誠正、格致之學救中國之弊。這一主張在三代之經典中本已存在，而如今歐洲講求實理、實業，故而能超越中國的浮華詩文，與日用無補。以古代經典詮釋西方制度，聽者的反應大多默然。<sup>⑥</sup>岡千仞推崇魏源《聖武記》所論水師與向西方學習。“而今開四所機器局，謂我已有彼長技，悍然起與交鋒，此未為得焉。”<sup>⑦</sup>書中多次引用魏源《聖武記》、《海國圖志》兩書，可見明治時期魏源的著述在日本影響之深。岡千仞對魏源的見解十分佩服。在與袁昶講論時事時，岡千仞引魏源說法稱：“方今急務，在綜核名實；綜核名實，在舍楷書帖括。”岡千仞更進一步指出，“綜核名實”的根本在於仿效歐美，振興科學技術。<sup>⑧</sup>

#### 四、結語

《觀光紀遊》在日本刻印出版，預期的閱讀對象是具有漢學修養的日本人。全書採取比較的眼光，表達了作者在旅行途中對於中學、西學和日本學術的思考。雖然岡千仞對日本古學有較深了解，但在中國時期，對於當時中國流行的樸學研究（與日本古學同源）不甚熟悉，亦不願深究。詩文應酬時，中國士子的豐富學養雖能贏得岡千仞的讚歎，但在岡千仞看來，中國內地無論是風俗、制度、民情、衛生、建築等等，都處於崩頹不振的狀態。在清末中國，鴉片破壞民眾體格，經學和科舉使士子無暇亦無心顧及經世學問和西學，讀書人眼界不開，則國家無法前行。岡千仞由此而提出的“六經毒”和廢科舉的主張，並非是要求完全拋棄中國經典和科舉制度，其背後有複雜而深刻的含義。岡千仞所有觀察感悟的出發點和對照物，是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社會的主導潮流是歐洲人的價值觀，受此影響，岡千仞推崇歐洲傳來的新學，並竭力以中學經典解釋西方學說的正當性；在中國期間，願意、渴望與對西學感興趣的中國士人交流。岡千仞對中

<sup>⑥</sup> 《粵南日記》卷中，194。

<sup>⑦</sup> 《滬上日記》，71。

<sup>⑧</sup> 《燕京日記》卷下，116。

國的批評也以明治日本為參照，以西方的富強標準為出發點，認為中國須學習實學，發展經濟，才能和日本一樣振興國家。這種對比，顯然更增加了岡千仞和日本讀者對日本維新的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同處十九世紀末期的亞洲，中日兩國的學術風向一則守舊，一則趨新。岡千仞通過遊記的文本書寫，對比出在歐洲新學的影響下，晚清時期中日兩國的學術生態。雖然旅行帶有冒險和驗證想像的目的，岡千仞此行似乎得償所願。

（孫瑩瑩 香港 香港大學文學院）